

徽学与明清史探微

——周晓光学术文集

周晓光◎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北京
安徽大学出版社

徽学与明清史探微

——周晓光学术文集

周晓光◎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学与明清史探微:周晓光学术文集/周晓光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8. 10

(安徽大学历史学文库)

ISBN 978-7-5664-1558-5

I. ①徽… II. ①周… III. ①文化史—徽州地区—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K295.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2890 号

徽学与明清史探微——周晓光学术文集

Huixue yu Mingqingshi Tanwei Zhouxiaoguang Xueshu Wenji

周晓光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29.5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ISBN 978-7-5664-1558-5

策划编辑: 鲍家全 李 晴
责任编辑: 李 晴
责任印制: 陈 如

装帧设计: 李 军
美术编辑: 李 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自序

本文集收录 41 篇文章,最早的发表于 1986 年,最晚的是 2012 年,时间跨度有 20 多年。所收文章内容,大而言之,一是徽学,二是明清史,故取书名为《徽学与明清史探微》。而“探微”者,一则反映收录文章所探讨的问题关乎徽学与明清史,但涉及面不广,只是有关专题的讨论;二来表示因受见识局限,相关观点仅表一孔之见而已。

文集收录的有关徽学研究论文,主要包括三部分:

一是关于新安理学研究的论文。新安理学是朱子学的重要分支之一,主要流传于徽州(古称新安,今安徽省黄山市)一带。该学派崛起于南宋、发展于元代、全盛于明初、衰落于明季、终结于清中叶,对 12 世纪以后中国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5 年,我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张海鹏先生研习明清史。因受张先生关于徽州地区“商成帮,学成派”观点的影响,遂将新安理学作为攻读硕士期间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时,新安理学并不为学界所了解,从学派角度研究新安理学更是个空白。只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张海鹏先生在其发表的《朱升和〈朱枫林集〉评议》一文中,提到过新安理学在“宋元明时期是个学派”。我以清人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中“新安理学”条为线索,爬梳《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清儒学案》等

有关学术史的著述,特别是在当时发现和查阅了包括程敏政《新安文献志》、程瞳《新安学系录》、施璜《紫阳书院志》等在内的大量徽州方志、徽人文集、徽州家谱等文献,厘清了新安理学从南宋朱熹开始,一直发展到清中叶 600 余年的学派谱系,并发现该学派始终有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一脉相传的理学家群体和鲜明的学派特色。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硕士论文《试论新安理学的演变》(1988 年)。从 1988 年开始,先后发表《试论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的转变》(1988 年)、《南宋新安理学略论》(1989 年)、《宋元之交与元代的新安理学》(1991 年)、《宋元明清时期的新安理学》(1993 年)、《论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朱升与郑玉》(1994 年)、《论程大昌的理学思想》(1994 年)、《新安理学源流考》(1997 年)、《论新安理学家赵汴的春秋学说》(1998 年)、《论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赵汴》(2000 年)、《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社会》(2001 年)、《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2003 年)、《程敏政〈道一编〉评议》(2003 年)、《南宋徽州人文环境的变迁与新安理学的形成》(2003 年)、《试论朱熹在徽州的理学教育活动及其影响》(2004 年)、《朱熹与严州理学的发展》(2012 年)、《〈家礼〉与明清徽州男子伦理生活定位》(2014 年)、《试论北宋及两宋之交的徽州理学思潮》(2015 年)等 10 余篇论文,时近 30 年。上述论文勾勒了新安理学学派的发展脉络和基本风貌,为学界进一步开展新安理学与徽学研究奠定了相关的基础。本文集收录的其中部分成果,大致反映了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二是关于徽商研究的论文。上世纪 80 年代中叶我在安徽师范大学读研期间,正值张海鹏、王廷元、唐力行、王世华几位先生将徽学尤其是徽商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他们在广泛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从搜集整理资料入手,组成徽商研究团队,于 1985 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徽商资料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此后徽商研究团队承担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在内的多个省部级项目,先后合作出版了多种徽商研究成果。受团队的影响,我在做新安理学研究的同时,也关注并参与了徽商的研究。1993 年,我参与编写的《中国十大商帮》之《徽州商帮》由黄山书社出版;

1995年,我与他人合著的《徽商研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我作为第一作者的《徽商与经营文化》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在团队集体项目的分工中,我主要承担徽商衰落及其在近代转型的研究,因此先后发表了《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社会的战乱与徽州商帮的衰落》(1996年)、《论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在徽茶贸易中的地位》(1997年)、《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的衰落》(1998年)、《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2000年)等系列论文,就晚清徽商的相关问题作了探讨。与徽商相关的论文还包括《明清徽商建筑文化的特色》(2000年)、《徽州盐商个案研究:〈二房货产清簿〉剖析》(2001年)、《略论明清徽商的“儒道”经营理念》(2004年)、《徽商与明清两浙“商籍”》(2011年)等。上述论文中的一部分也被收录在本文集中。

三是关于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的论文。在对徽学相关问题有一定学术积累之后,如何超越自身局限、拓展学术视野、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2002年,机缘巧合,我有幸拜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先生门下攻读历史人文地理专业博士学位。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三年的读博期间,经邹先生耳提面命及中心各位先生言传身教,我因而能够较为系统地接受了历史地理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和训练。结合自身原先的研究领域,我开始尝试从地理和空间的角度探讨徽州传统学术文化诸问题,希望采用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别开徽学和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的途径。因此,我关注了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区、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中心地及空间传播方式与特点、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景观等问题,发表了系列论文,初步架构了从地理和空间角度研究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框架体系。其中部分论文被收录到本文集中,主要想反映我在拓展和推进徽学研究中所作的一些探索。

除上述三方面内容外,有关徽州宗族、徽州家谱、徽州文献等部分研究成果在文集中也有所反映。

1988年至2012年,我在安徽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的需要,开

展了明清史相关问题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文集收录的此类研究文章共11篇,涉及明代崇祯年间的宦官、明代太湖流域的水利、明代“大明宝钞”的通货膨胀、晚明地方兵民关系、清初顺治年间的政局、明清历史人物等内容。虽然题目较杂,但每篇都力求表达自己的观点,希望对学术界在相关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补充。

此外,文集还收录了5篇不同体裁但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其中,《张海鹏与安徽地方文化史研究》围绕地方文化史研究主题,从学术视角介绍和总结张先生的学术生涯和治学之道——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一位学术前辈,肯定其学术贡献和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裨后学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相关领域的研究。由我执笔的《〈安徽文化史〉导言》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总结了安徽文化延续性、交融性、多样性、早生晚熟以及突出的“通变”精神等基本特征,考察了安徽文化这一颇有个性特征的文化系统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评〈徽州文书〉的整理与出版》则从学术角度分析了《徽州文书》出版的价值和意义。

文集收录的上述文章,大致反映了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将近30年走过的学术之路。虽然一路走来,有名师指点和引导,有师友启迪和帮助,但囿于天资,成绩甚微。拙稿出版,一是希望个人作一个学术回顾,以有助于自己在未来史学研究道路上明辨方向,继续前行;二是希望我此前所做的些许学术研究工作,对学界在相关领域和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裨益。

任何研究及其成果,都是阶段性的,此中难免会有许多遗憾和错误。结集出版,实感诚惶诚恐。恳请专家和各位师友批评指正!

周晓光

2017年8月

目 录



1	■ 自序
1	■ 新安理学源流考
20	■ 试论新安理学长盛之因——从地域人文环境角度考察
27	■ 南宋新安理学略论
40	■ 试论朱熹在徽州的理学教育活动及其影响
50	■ 朱熹与严州理学的发展
62	■ 明辨义理,格物致知——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72	■ 论新安理学家程大昌
83	■ 宋元之交与元代的新安理学
96	■ 论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朱升与郑玉
114	■ 论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赵沍
128	■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
138	■ 程敏政《道一编》评议
150	■ 试论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的转变
163	■ 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社会
175	■ 徽州盐商个案研究:《二房贖产清簿》剖析
188	■ 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
209	■ 论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在徽茶贸易中的地位

- 222 | 19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国社会的战乱与徽州商帮的衰落
- 243 | 徽商与明清两浙“商籍”
- 256 | 明清徽商建筑文化的特色
- 264 | 略论明清徽商的“儒道”经营理念
- 274 | 徽州：12—18 世纪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典范之区
——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刍议
- 288 | 试论徽州学术文化区形成的地理基础
- 302 | 清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类型分析
- 316 | 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州社会风俗
- 327 | 论明代崇祯年间的宦官
- 338 | 明代归有光《三吴水利录》述评
- 348 | 从控制论看明代的通货膨胀
- 356 | 明初“工部造钞屡不就”考
- 358 | “诗、书、画三绝”的文征明
- 364 | “玩世自放”的才子祝允明
- 374 | 论明季“黔案”
- 385 | 论多尔袞—多铎联盟与顺治初年政局
- 394 | 多铎简论
- 406 | 训诂名物，实事求是——皖派朴学宗师戴震
- 415 | 始拥慈禧、继办洋务的奕訢
- 427 | 张海鹏与安徽地方文化史研究
- 441 | 《安徽文化史》导言
- 449 | 《徽州方志研究》序
- 452 | 评《徽州文书》的整理与出版
- 456 |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
- 460 | 后记

新安理学源流考



新安理学是朱子学的重要分支之一,主要流传于徽州(古称新安,今安徽黄山市)一带。该学派崛起于南宋、发展于元代、全盛于明初、衰落于明季、终结于清中叶,对12世纪以后中国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其近700年的盛衰过程中,始终有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一脉相传的理学家群体和鲜明的学派特色。

关于新安理学成派之说,在历史上有一个认识过程。明初新安学者赵汭在《商山书院学田记》中最早注意到新安理学的学派特征。^①此后,正德、嘉靖年间新安人程瞳编纂的《新安学系录》十六卷,成为新安学派“学案”性质的著作。清初著名学者赵吉士在其笔记《寄园寄所寄》中,专列“新安理

^① 赵汭:《东山存稿》卷4《商山书院学田记》称:新安之学“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赵氏于此处点明了新安学术有宗师,有特色,有传授脉络。

学”一条,最终肯定了新安理学作为一支地方理学流派在历史上的存在。^①近代以来,从学派角度研究新安理学一直是个空白,直到本世纪(指20世纪)80年代初,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张海鹏先生发表《朱升和〈朱枫林集〉评议》一文,^②才重开新安理学研究之先河。

本文关于新安理学源流的考察分四部分内容:(一)南宋,新安理学之崛起及其特色。(二)宋元之交与元代,新安理学的发展及其特点。(三)元明之际与明代,新安理学之盛而复衰。(四)清中叶,新安理学的终结。我们希望就新安理学源流问题的考察,有助于学术界对新安学派展开全面的研究,并通过此项研究反映宋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演变轨迹。

一、南宋:新安理学之崛起及其特色

南宋(1127—1279年)是理学集大成时期,也是新安理学崛起的时代。据明代程敏政《新安文献志》、程瞳《新安学系录》和清初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及新安方志记载,在南宋150余年间,新安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理学家。其代表人物有:朱熹(字仲晦,婺源人)、吴昶(字叔夏,歙县人)、程永奇(字次卿,休宁人)、程大昌(字泰之,休宁人)、吴儆(字益恭,休宁人)、汪莘(字叔耕,休宁人)、程洵(字允夫,婺源人)、程先(字传之,休宁人)^③等人。他们以朱熹为泰山北斗,鼓吹理学,传授朱子学说,奠定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新安理

①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新安理学·案》:“新安自紫阳峰峻,先儒名贤比肩接踵,迄今风尚醇朴。虽僻村陋室,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屈也。呜呼!千秋俱在,岂徒尚口;前徽不远,有志当型。略撮世所共尊者数人,可以兴矣。”赵吉士认为:(1)新安理学的“先儒名贤”都是朱熹的后继。他称赞胡一桂(双湖先生)和胡炳文(云峰先生)“俱能力肩正学”,并认为这是“朱子余芬”所致。又推重陈栎(定宇先生)为“朱子功臣”。实际上赵氏肯定了朱熹及其学说在新安理学中开山祖的地位。(2)指出了灿若繁星的新安理学家群。赵氏列举了始于南宋朱熹,迄于明初朱升、赵汭等十余位“世所共尊者”新安籍理学家。可见,他已明确认识到,新安理学是一脉相承的一个理学流派。

② 《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二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程先生卒年待考。先为程永奇父。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69《方虚谷:东隐程先生(先)墓表》谓朱熹省墓时,先“年已七十余”。据此,程氏生年当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以前。虽生活年代主要在北宋,然其崇拜理学则在朱熹绍兴二十年(1150年)回婺源省墓之后。故亦系于新安理学这一时期内。

学之基础。

南宋新安理学之崛起,与北宋理学思潮渊源极深。首先,新安理学家的学风,由北宋理学大师处承继而来。他们与汉唐古文经学重训诂义疏的传统背道而驰,抛开传注,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如吴昶著《易论》《书说》,程永奇著《六经疑义》,程大昌著《毛诗辨证》《尚书谱》等,均借助经文,参以个人体会和一己私见,从中探求性命义理之说。其次,南宋新安理学家还直接继承了理学先辈的论题与思想成果,如程大昌在《易原》中论“太极”“五行”“动静”“阴阳”等,在周敦颐著作中已屡屡提及,又为北宋理学大家所反复讨论和发挥。程永奇注释《明道定性说》《伊川好学论》《太极图说》《西铭》,梳理北宋二程、周敦颐和张载等理学名家的思想与思维方式,从中吸取营养。再次,作为新安理学开山的朱熹,其师承可直溯至周敦颐。《宋史·道学传》记载:周敦颐学术传程颢、程颐,二程传杨时,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①作为新安理学“真传”的朱子学,亦是集北宋理学大成的学说。因此,从学术渊源来看,南宋新安理学的出现,是“其来有自”的。

南宋新安理学之崛起,又以汉文化重心南移为历史背景。自古以来,汉文化之中心在黄河流域。唐末及五代十国北方战乱频仍,中原大族纷纷南避,促进了南方汉文化的发展。新安地处皖南山区,“世乱则洞壑、溪山之险,亦足以自保,水、旱、兵戈所不能害,固宜其有强宗巨姓雄峙于其间”。^②因此,自唐末及五代十国以后,迁入其地之中原大族尤多。中原大族入迁后,致该地区文化得到长足发展。诚如罗愿《新安志》说:“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③靖康二年(1127年),汴京沦陷,宋室南渡,汉文化重心由黄河流域移至长江流域。^④地处江南的新安,在前期文化发展基础上,更出现“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

① 脱脱等:《宋史》卷427、卷428,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城东许氏重修族谱序》。

③ 罗愿:《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

④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第3节,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余英:《宋代儒者地理分布的统计》,载《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6期。

于天下”的壮观景象。^①正是缘于汉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的历史背景，南宋新安涌现了大规模的理学家群。从地理位置上看，朱熹所开创的新安理学，属于南方学术。它的兴起，改变了以往理学以北方“关、洛”称盛的局面。理学由关、洛而发展到新安，与唐宋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之南移趋势一致。

此外，新安重儒的文化环境，以及历届地方政府对文教的推崇，也是新安理学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两宋时期，新安“业儒”与讲学之风极盛，文人士大夫不乏人，其中“多长于谈经者”，从而出现了一批较早的“新安理学名儒”。

南宋新安理学崛起后，形成了三大特色。

第一，学派以朱熹为中心，学术以朱子之学为宗旨。

综观南宋时期新安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大致可分为二类：一是朱熹学生，且多为及门弟子。如程洵、吴昶、汪莘、程先、程永奇等，曾先后执经馆下，受学于朱熹，称得上是朱门嫡出。二是朱熹学术酬唱之友，因此，整个学派实际上以朱熹为核心人物。

南宋新安理学中师承朱熹的学生，完全以研习和传播朱熹学说为己任，具有终身不移尊奉朱子之学的信念。譬如程洵，初以诗文求教于朱熹，朱熹劝程洵着意于“古人之学”，并亲自易程氏“道问学”斋名为“尊德性”。程洵入朱熹门下，于理学精研不已，著有《克庵尊德性斋集》10卷。据称，程洵任衡阳簿时，“士友云集，登其门者如出文公（朱熹）之门”。^②可知，程氏学术深得乃师真传。再如吴昶，在朱熹回婺源省墓时，“幡然悟俗学之陋，率先执经馆下”，后又“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学，得文公心印”，并且“终身守其师说，造诣愈深”。^③无疑，吴昶也是朱氏的忠实信徒。还有程永奇，初从朱熹求学一年，临返，朱熹以“持敬明义”之说勉励。后程永奇临终时，对门人书

① （嘉庆）《休宁县志》卷1《风俗》。

②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69《汪路教：程知录（洵）传》，弘治三年（1490年）刊本。

③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69《友堂吴先生（昶）小传》，弘治三年（1490年）刊本。

一“敬”字而逝。^①可见他们学术之循规蹈矩,不偏朱子学之心法。与朱熹为学术知己的程大昌、吴儆等人,虽未列朱氏门墙,然其理学思想与朱子之学具有共通之处。^②因此,南宋新安理学出现以朱子学为宗旨的鲜明特征。

第二,既强调品格的修养,又推重躬行实践之处世,深得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要旨。

宋儒讲心性,主张“养心”“复性”。南宋新安理学家亦不例外,强调个人心性之修养。如程洵以“尊德性”为座右铭,程永奇奉“敬”为学问根柢,程大昌著有《中庸论》四篇,提出心性修养之终极目标及其方法。然而,与后世迂儒空谈性命义理不同,在提倡心性修养的同时,南宋新安理学家也主张积极入世,参政议政,将其学说付诸实践。《大学》所说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新安理学家看来,其中并无偏废。修身之目的,在于治国经世。钱穆先生说:“当知宋学所重,外面看来,好像偏倾在私人的修养,其实他们目光所注,则在全人类、全社会。”^③这个评语,对南宋新安理学家来说,最是贴切。

如新安理学“始祖”朱熹一生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对朝廷吏治、经济、和战等事,都提出过积极建议。又如吴儆,历任明州鄞县尉、宣教郎等职。吴氏虽“穷居厄处,抱膝长吟,常以社稷安危为己任”。^④汪莘,嘉定间屏居黄山,应诏“三扣天阊,论天变、人事、民穷、吏污之弊,行师布阵之法”。^⑤可见,他们的目光所注,心意所及,并非只是心性义理,对社稷安危也是事事关心。在南宋新安理学家中,以程大昌官职最显。他不仅是学有造诣的新安理学先哲,也是一位深有影响的三朝经世名臣。南宋新安理学家已将儒家传统的积极入世的人生要旨,融会到自己的立身行事中。这是南宋新安理学的又一大特色。

① (嘉庆)《休宁县志》卷12《人物》。

② 周晓光:《论新安理学家程大昌》,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③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版。

④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69《吴儆行状》,弘治三年(1490年)刊本。

⑤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87《汪居士(莘)传》,弘治三年(1490年)刊本。

第三,南宋新安理学家深受佛教影响,又将排佛作为己任。这种现象,在宋代理学家中普遍存在,而以新安理学尤为突出。

南宋新安理学家深受佛教影响,这一点当无疑义。譬如朱熹与园悟、藻光等人往来密切,^①汪莘“韬铃之书、释老之典,靡不究习”^②等等。不过,新安理学家在其立身行事中极力攘斥佛教,这也是事实。《宋史·朱熹传》载:朱氏“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妇之为僧”。他在上孝宗书中,称老子、释氏之书“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③认为佛老“不足事”。^④排佛可谓不遗余力。程大昌自称一生不与“缁黄方技之士”打交道。^⑤淳熙二年(1175年),程氏再次入朝为官,首章即反对六和塔寺僧以镇潮为功,免除科徭。其于佛门之态度,可见一斑。

因新安理学家之排佛,佛道在新安一直不得势。后人编纂《岩镇志草》曰:“吾里于二氏无大经营。”^⑥说明新安儒风醇厚,佛道之教,在此难以弘扬。

二、宋元之交与元代:新安理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宋元之交及有元之世,朱子学及其面临的环境,已迥然异乎前代。因此,以固守朱子学为宗旨的新安理学,也与其早期有着明显的不同。根据它的时代特点,我们将宋元之交及有元一代,视为新安理学发展的第二时期。此期代表人物有:程若庸(字达原,号勿斋,休宁人)、吴锡畴(字元范,号兰皋,休宁人)、许月卿(字太空,婺源人)、胡允(字方平,号潜斋,婺源人)、胡一桂(字廷芳,号双湖,婺源人)、黄智孙(字常甫,休宁人)、程逢午(字信叔,休宁人)、陈栌(字寿翁,学者称定宇先生,休宁人)、胡炳文(字仲虎,学者称云峰先生,婺源人)、程复心(字子见,号林隐,婺源人)、倪士毅(字仲弘,休宁人)等。

① (雍正)《崇安县志》卷8《释》。

②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87《汪居士(莘)传》,弘治三年(1490年)刊本。

③ 脱脱等:《宋史》卷429《朱熹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69《滕公璘墓志铭》,弘治三年(1490年)刊本。

⑤ 程大昌:《考古编·序》,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 余瑞华:《岩镇志草·发凡》,雍正十二年(1734年)刊本。

综合考察元代新安理学情况,可以发现几方面的新气象:首先,新安理学家(尤其是中、小理学家)关于理学的探讨,已经从一般论题的泛泛而论,深入具体范畴的阐释和考辨。这一研究方向和方法论的转变,标志着新安理学的深化与发展。其次,有一定建树和影响的新安理学家大规模涌现。清初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列举的15位最著名的新安理学家中,这一时期就占了6位。复次,大量理学普及读物出现。它意味着新安理学家已努力将理学从学术界推向社会领域。上述情况充分表明了新安理学在元代的长足发展。

元代新安理学有其时代特色。

在学术方面:维护朱子学的纯洁性,将排斥“异论”、发明朱子学本旨作为学术研究的重心。

元代新安理学出现这一学术特色的原因,同入元之后朱子学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趋向有关。元代理学发展有两大趋向:一是因为朱子学被定为科举程式,所以士人大多将它视为获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着一字一义的说教,以注疏集注为学问之大端,而其中真正学有心得者,则寥寥无几。二是朱学的传人,基于各自的学识、经历等,各持一端,以致“异论”纷出,乱朱子学本旨。其时朱门状况诚如程敏政(篁墩)所称:“再传能不失真者,则已寡矣!”^①针对这种情况,号为朱门嫡传的新安理学便形成了以维护朱子学纯洁性为研究工作重心的学术特色。

新安理学家如何维护朱子学的纯洁性呢?他们着重做了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凡诸儒之说,有悖于朱子学者,或订正其偏误,或者干脆刊而去之。陈定宇的《四书发明》《书传纂疏》《三传集注》,便是此类著作。胡云峰的《四书通》则专门为纠正徐干饶鲁之学而作。这些著作风格泼辣,直抵时人谬误,取舍之间,惟以朱子学为归。此外,又有吴师道(字正传,婺源人)“务在

① 程瞳:《新安学系录》卷15《陈定宇遗事》,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绿荫园重修本。

发挥义理，而以辟异端为先务”；^①程复心《纂释》等书“辨证同异，增损详略”^②等等。元代新安理学家极力抵排诸儒“异说”，以此作为维护朱子学纯洁性之一翼。其次，凡朱子学中的微词隐义，引而申之。其所未备者，补而益之。新安理学家力求朱子学正确阐发，令诸家“异说”不攻自破，从而在另一翼维护朱子学的纯洁性。就师承来看，此期新安理学家大多是朱熹的再传、三传或四传弟子。因而其学术与朱子学渊源极深。他们终生潜心探索，务在得朱学之正。如程定宇于“朱子《四书》，则贯穿出入，尤所用意”，^③所著书“补先儒未补之阙”，^④号为“朱子世适”。^⑤胡云峰于朱子学本旨有极多发挥，元代理学大师吴澄称其“有功朱子，炳文居多”。^⑥就胡氏《四书通》《易本义通释》等书来看，吴澄所誉，当不为过。陈、胡二氏是向“异说”挑战的急先锋，同时又是发明朱子学本旨的功臣。其他如程逢午、程复心、汪古逸、程荣秀等，于朱子学亦有发明。

在政治方面：顽强抵抗元政府的征召与聘请，于科举功名，不屑一顾。这种政治不合作倾向与南宋新安理学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称：“新安之学，自山屋（许月卿）一变而为风节。”^⑦换言之，从南宋朱熹等人积极入世，转变为元代新安学者尚“风节”而不求仕进，其中以许月卿为关键人物。许氏是南宋淳祐甲辰（1244年）进士，曾任南宋濠州司户参军、临安府学教授等职。后元军下新安，月卿“深居一

① 宋濂等：《元史》卷190《吴师道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 程瞳：《新安学系录》卷12《赵与虎：荐状》，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绿荫园重修本。

③ 程瞳：《新安学系录》卷12《汪古逸：陈定宇行状略》，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绿荫园重修本。

④ 程瞳：《新安学系录》卷12《金石：赞》，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绿荫园重修本。

⑤ 程瞳：《新安学系录》卷12《陈定宇遗事》，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绿荫园重修本。

⑥ 程瞳：《新安学系录》卷12《胡云峰遗事》，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绿荫园重修本。

⑦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9《介轩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